

守心如磐，仁者爱人

□谢宗玉



5月风暖，明媚的氛围让人心情舒畅，突然就想起张守仁老师来。时至今日，他的样貌我已无多少印象，但他洪亮的声音，每至春日暖阳，都会如期在我的耳侧回响。那种熨帖人心的暖意，竟成了我文学生涯中，一道温润的底色。

我与守仁老师仅有一面之缘。那是在2007年的初冬，那天阳光很好。彼时我正在鲁院读书，妻儿来京看我。趁国庆假期，我们一家去拜访守仁老师，却将我藏在心底多年的歉意与谢意。7岁的儿子穿着一身喜庆的唐装，眉眼间尽显天真烂漫。未承想，开门的守仁老师竟也身着唐装，紫色面料，更衬他慈祥的面容。一老一小，一艳一素，交相辉映，恍惚如寻常爷孙。儿子与他那份天然的亲近，瞬间化解了我一路而来的忐忑与局促。

师母亦是温和之人，见了我儿子，大约是想起了远在他乡的外孙，亲热得不得了，眉眼都弯成了月牙儿。她拉着儿子的小手，在屋里转转停停，很快就用零食将他的口袋塞得满满的。然后她又找出几件外孙珍藏的玩具，让他把玩戏耍。我记得有玩具车和玩具枪。分别时，千推万推，师母还是让我儿子将一只他特别喜欢的望远镜带回了家。那份来自北京的温情，陪着儿子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懵懂岁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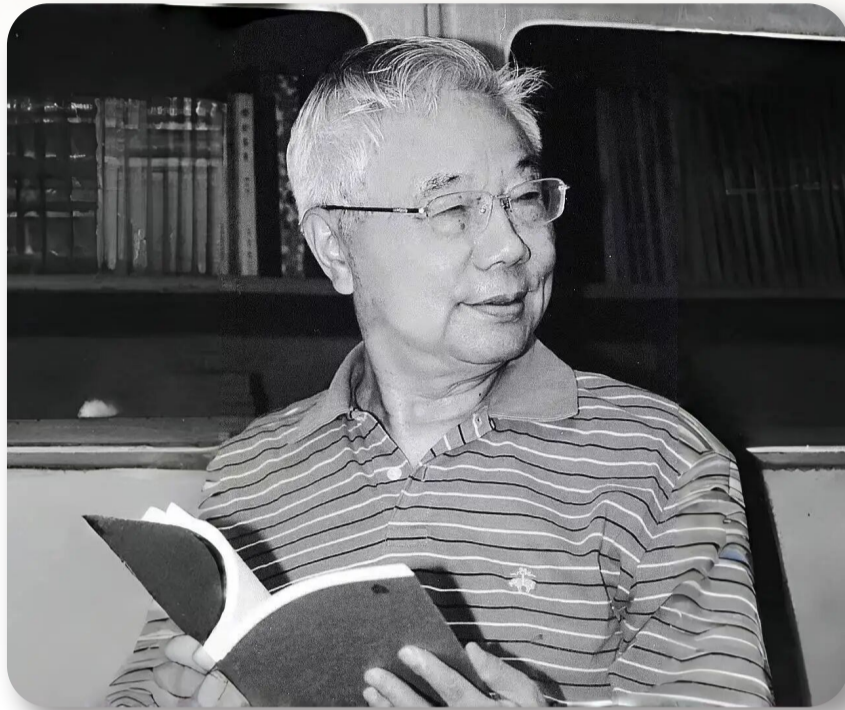
我与守仁老师在客厅闲谈。他语速平缓，语气温和，从容自然，没有半分架子，仿佛不是面对一位素未谋面的基层作者，而是与他相交多年的朋友。他问了我的近况，以及未来的打算，勉励我沉下心来，好好创作，不要被世俗功利蒙了双眼。师母与儿子的笑声，隔着门缝飘过来，与我们的谈话交织在一起，

是那么温馨和谐，竟让我有一种如家般的踏实感。

我此番登门，主要还是向守仁老师致歉。那桩旧事，如一根细刺，卡在我心里好些年了。省里给我的说法是，2003年非典肆虐，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遴选推迟一年，后来我才知真相并非如此。2002年，我将自己的文稿报送上去后，一直耐心等待，却没有回音，我以为自己已然落选。恰在此时，一位北京书商向我约稿，首印数和版税都不错，这对我而言，无疑是雪中送炭。彼时我积攒的文稿，已足够出三本书了，便想着，即便从书那边后续有消息，两本书差不多时间出版，想来也不算违规，于是便将文稿交付书商，任其遴选。

没过多久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田垌上的婴儿》便得以出版。巨大的喜悦，让我把报送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之事完全给忘了。2003年下半年，守仁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，说我的书稿获全票通过，他会亲自为我作序。很快，遴选结果就在网上公示了，不久我也收到了入选2004年度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通知。这个消息真让我喜出望外，想象自己的文字配上先生的序言，跻身那套承载无数青年作家梦想的丛书中，是何等的幸福。

可这份欢喜，并未持续太久。编审委员会很快便收到举报信，称我已出版过书籍，不符合“首次出书”的遴选标准，只能将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。我有口难辩，唯一一遍遍解释，我交稿之时，确实未曾出书。而最让我愧疚的，并非错过了这次机会，而是守仁老师已然为我写好了序言。那序言，不知耗费了他多少心血。如今书不能出版，他的辛劳付诸东流。握着电话，我满心愧疚，语



张守仁

无伦次地向他道歉。而他只是呵呵一笑，语气温和，没半分责备，轻描淡写便将此事揭过了。

长者的宽厚与包容，将我的愧疚消解了不少，也让我对这位文坛前辈生出了更深的敬意。一年后，承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谢大光老师的厚爱，将我这部作品以《村庄在南方之南》之名出版了。经守仁老师的同意，我将他的序言用在了这本书里，总算没辜负他的辛劳，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份心安。

那次见面后，我深入了解守仁老师的过往，才知他是那时中国文坛的旗手

之一。作为北京“四大名编”之一，他既是《十月》杂志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深耕文坛数十年的编辑家、散文家、翻译家。四十年间，他编发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等无数经典作品，扶持了一代代作家，为新时期文学的崛起倾尽心力。他翻译过屠格涅夫的系列散文，出版过《废墟上的春天》《文坛风景》等佳著，其中《林中速写》《老船》等篇章，还荣获大奖，被编入十种选本与中学课本，以凝练的文笔、真挚的情感，滋养了一代读者。退休后，他仍坚守文坛，担任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初编编委，将全部心血倾注

于对青年作家的扶持，被人称作“文学界的幕后英雄”。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大家，为人却谦逊温和、质朴赤诚，面对来自乡野的一位基层作者，也没有半分轻重。

因为敬重与喜爱，我后来读了守仁老师的不少作品。守仁老师的散文素来秉持“有我、独特”的准则，不事浮华，不尚雕琢，文字凝练如璞玉，情感真挚如清泉。写文坛人物，寥寥数笔，便形神兼备，《文坛风景》中，那些文人雅士的风骨与个性，被他娓娓道来，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美感。写自然景观，如《林中速写》，笔墨灵动，意境悠远，将原始森林的生机与哲思，熔铸于文字之间，让人读之，如身临其境。写人情世故，如《你就是爱》《寻找勿忘我》，于细微处见真情，于平淡中藏悲悯。他的翻译作品，力求“神似”，摒弃洋腔洋调，将俄苏文学的精髓，用流畅自然的中文呈现出来，让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字，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。守仁老师的文字，如他本人，温润而有力量，朴素而有风骨，读来让人沉静平和，也让人愈发懂得，何为文品，何为人品。

我出生于山村，是名副其实的“社恐”，素来不善于主动打扰。更何况守仁老师年事已高，精力有限，认识他的基层作者，哪怕一人一年只给他打一个电话，都会把他给累着。我只能将这份敬重，默默藏在心底。

可未曾想到，反倒是守仁老师，偶尔会给我打来电话。大概是2013年前后，我在《随笔》杂志上不定期开设影评专栏。有一年6期杂志，刊登了我的5篇文章。想来先生是订阅了这份杂志，竟对我的影评颇为喜爱，前后至少三次打来电话，与我探讨文章诸种思想

的中正与偏颇。我至今记得，有一次我在火车上，信号时好时坏，可守仁老师依然热情与我交谈，一聊便是40多分钟。我们从电影本身，聊到古今中外的政治、经济与民生……他语气谦和，与我交换意见。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记得当时车厢的嘈杂。在那样的环境下，我们竟然交流了那么久，实在不可思议。正是这样一些闲聊，让我真正走进了守仁老师的内心，窥见了他部分的人生观、世界观与价值观，领略了他作为知识分子难得的坚守与气节。

后来机缘巧合，我又认识了守仁老师定居海外的女儿。她学养丰赡、温文尔雅，身上有着守仁老师的谦和与通透。同时我也认识了守仁老师爱唱歌的外孙，少年意气风发，回国参加湖南卫视组织的“快乐男声”，杀进24强后，因学业繁忙，又潇洒离去，让我等听众皆惋惜不已。想来，这不仅是家族基因的馈赠，更离不开守仁老师润物细无声的教育。后辈哪怕是身在异国他乡，却仍然守着中国文脉与家风。

2024年5月28日，噩耗传来，守仁老师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1岁。彼时，我父亲正生病住院，我分身乏术，无法去送守仁老师最后一程，唯有定制一花圈，遥寄哀思。那一刻，心底的悲痛，如潮水般涌来，却又只能硬生生忍住不发。我知道，守仁老师一生乐观开朗，定不希望我们太过伤感。守仁老师逝世后，我与他们家仍有交往，与师母姐经常会在微信朋友圈里点赞问候。

此时，窗外林木向荣，树叶婆娑。念守仁老师，言有尽，情无尽。守仁老师的风骨与温情，终将如点点星光，继续照亮中国文学的漫漫前路，也将永远留在那些受他恩惠、念他感情的后辈作家的心中。

他的生命与诗歌同在

□王世龙

这天晚上，我收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韩晶玉教授的短信，他问我要2023年10月在济南和诗评家袁忠岳先生相聚时合影的照片。我没有多想，回复他明天到备存的U盘里找。待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微信，看到他转发的消息，却是袁忠岳先生去世的讣告。先生于2026年4月3日上午11时49分在日照逝世，享年90岁。

惊悉噩耗，我万分悲痛。记起去年8月，我回到老家莒县，得知先生在日照的儿子家度暑假，便打电话联系先生约好时间，和众文友一起欢聚于海滨。席间，大家谈文学、谈诗歌、谈生活、谈健康，其乐融融。先生虽已近90岁，但精神矍铄，谈笑风生，还向大家分享了如何战胜疾病的经验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作息。哪里想到，先生突然就离开了我们。

我与先生的相识，源于诗歌。在那个文学潮涌的20世纪80年代，闭塞的山沟角落同样也受到文学的呼唤。当年才20多岁的我，虽然对文学创作还处于懵懂状态，但被那缪斯之梦深深吸引着，在老家莒县大石头乡中学创办了山泉文学社。那个时候还较贫困，连纸张都是缺乏的，还是党委办公室给我们提供了纸张。我边发展社员边约稿编辑，找学校两位写字好的老师帮忙，用铁笔、钢板、蜡纸设计刻板，用油墨辊子印出来，再用订书机订成刊物。这个过程持续了约半年时间。由于蜡纸的质量和刻字技术不过关，每张蜡版

印五六十份就不行了，因此，每期只能印五六十册。我们通过邮局寄给所知道的报刊，盼着他们能择优发表；同时，还慕名寄给本省的几位作家和文学专家。其中，袁忠岳先生就是我们敬仰的一位。

袁先生当时在诗歌界已颇具影响力。他和吕进、阿红、叶楠、朱先树、杨光治、朱子庆等青年诗评家形成了“上园诗派”，倡导尊重诗歌的艺术规律，主张传统经验的现代化以及西方经验的本土化，打通古今，融贯中西，为推动诗歌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。他以诗评家的前瞻性眼光，敏锐地把握20世纪80年代所涌现出的诗歌现象，往往能准确地抓住痛点与症结给予评判，是当时“朦胧诗”最早的支持者之一。他在争鸣中坚持自己的诗学观点，表现出了作为一代杰出诗评家的风度与气度。

由于生活环境与读书视野的狭窄，那时的我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一知半解。我只是在《黄河诗报》等报刊上读到袁先生的名字，按文后介绍的单位冒昧寄去社刊《山泉》。不久，他回信了，对我们给予热情的指导，并欣然应允做文学社的顾问。

他在1989年11月12日的信中说：“从总体看，《山泉》水平在不断提高，风格流向是多种多样的，也有很现代派的诗，如《真的无题》（蓝野），也有很现实的诗，像你写的几首。不过，总体觉得在切近与深刻地接触时代与现实上显得不足。我们存于其中的现实生活影

子太淡，难以有震动人心的效果。不是一定要直接去写生活，可以写山水日月，但一定要是现实生活体验的沉积。诗之价值，取决于体验的深浅、沉积的厚薄，直接写生活的，也不一定就切近现实，更不一定深刻，这里也有一个体验与思考的问题。在艺术表现上则应追求新求异，有与众不同的追求。”袁先生诚恳的话直指问题所在，给人启迪。对于初出茅庐的我们，他的指点迷津与引领方向，是多么重要啊！

山泉文学社以我、蓝野和山妹为主要参与者。到1991年时，我们已团结了一批山东青年诗人，于是我们编选出版了诗歌合集《土地的花冠》。为了提高诗集的分量，我写信向诗歌前辈臧克家先生求写了书名，同时让刚师范毕业、在乡村小学任教的山妹，乘坐长途客车前往济南山师大拜请袁先生作序。

袁先生当时工作繁忙，但当看到风尘仆仆的山妹时，还是连夜赶写出了《我的祝福》。序言开头写道：“一个炎热的下午，素不相识的山妹叩开了我的房门，说是山泉文学社派她来的，她们要出版诗歌合集，校样已经出来了，差一个序，想让我给写一个，不知行不行。面对风尘仆仆、汗珠凝额的她，面对山里人朴实坦然的脸，面对只有诗的忠实信徒才有的虔诚的眼神，我不忍用任何借口搪塞她，把她拒之门外。我应允了。”他在序言中对我评价道：“（王世龙）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没有因为残疾而对生活失去信心，相

反，却以加倍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属于他的以诗为内容的新而美的生活。他把学习与教学的剩余时间全部献给了诗，不是写诗，就是编诗、刻诗，其实他的学习与教学何尝不是为了诗呢？无法想象，离开了诗，他如何生活。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通过诗与文学社他认识了许多朋友，许多朋友也因此认识了他……现在，他没有急急地忙于出自己的诗集……而是首先考虑为文学社的成员集体出一本诗集，为此忙乎了半年，付出了大量心血，才始有眉目，这也是很难得的。”

他对诗集作品的评价很中肯，也指出了问题所在：“既然是一个合集，集中的诗作难免参差不齐，对此不能苛求。一个山区农村学校的文学社能向社会展示这样一个诗歌面貌，已足令人刮目相看了。诗集中散发出来的泥土气息，给人一种祥和安慰之感，勾起了人们对故乡童年纯真生活的回忆。人离故土，心能离故土吗？在表现方式上已能不同程度地摆脱原有思维模式的束缚，去追求更为现代的表现手法……”

如今再读先生发自肺腑的文字，心情怎能平静？

1989年冬天，先生到沂南县为临沂地区文联举办的文学讲习班授课。当他得知莒县和沂南县相邻，便委托沂南县委宣传部领导打电话到莒县宣传部，宣传部又将电话打到我任教的学校，邀请我及文学社的骨干去听课。可是不巧，我那天已定下参加县教育局教研室举办的

公开课展评，不能请假。于是，我让文学社副主编蓝野代表我们前往。就这样，我错过了与先生见面的机会——每每回忆起来总是感到愧疚与遗憾。

蓝野回来后，带给我先生的诗歌评论新著《缪斯之恋》。听蓝野说，先生主要是想和我们见见面，才费心思托人打电话联系我们。蓝野作为临时参加的特邀学员，没有提前安排好住宿，先生便热情挽留他住在自己的房间。我听了十分感动。当我打开先生赠送的著作，见到扉页上写着“诗歌与生命同在”的赠语及签名时，更是心潮澎湃。

从此，我总想着有机会就去拜见先生。但事与愿违，与先生的见面却是在二十年之后了。20世纪90年代，我乘着市场经济改革和人才流动的东风，走出莒县的大石头山沟，来到北京做编辑。我为了心中的理想殚精竭虑，疲于奔忙，新的环境与工作让我渐渐疏于和先生联系。直到2009年1月，诗人林莽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办诗歌创作四十年诗画展，袁先生和山东大学的吴开晋教授等人从济南来到北京参加活动，我们才终于相见了。

此时他已70多岁，身体健朗，谈笑风生，犹如壮年。在参加活动的间隙，我们交流了不少话题。我得知他退休后，仍然在给学生们上课，不时参加一些学术活动，总是关注着诗坛的现状与发展。他的诗歌创作思想令我受益匪浅。正如他的学生、著名诗评家张清华为他的论著《诗学心程》作的序言中所说：“他的

诗学人格和理论著述将被时间证明是站得住脚的。”是的，先生正是把世界文艺思潮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通，从而创造出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诗学。

当我向先生介绍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和美好打算，并对自己没能专心创作而感到失意、愧对先生的期望时，他却理解我，还安慰和鼓励我。他说到我心里最深处的话是，你原来在家乡基层学校办文学社取得了实际经验，现在面向全国，舞台大了，视野更开阔了，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实现中小学文学教育与大学的链接，比你个人写诗的意义更大。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现在先做好你的事业，以后经历多了，体验也就深了，还会有时间写出好作品的。由此，我更坚定了目标，信心也增强了。在人生摇摆的时候，听到智者的一句话，如醍醐灌顶，让人不再彷徨。

袁先生正是因为热爱诗歌，才战胜困难，淬炼出人生的灿烂的。他同样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。幸运的是，他十几岁时，家乡贤达人士在他外公家的房屋中筹办了一个“小小图书馆”。他在那里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，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报考大学时，他在志愿栏里填写了中文系，梦想成为一名诗人、作家。虽然后来遭受了岁月的磨难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文学理想，最终选择了从事诗歌评论与研究这一事业。他以优秀的人品与文品，在当代诗坛留下了灿烂的身影。

先生的生命与诗歌同在！